

【专家特稿】

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目标与对话主体的规范

谢新水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48)

[摘要]现代社会,独白型话语在思想艺术、意识形态和官僚组织中占有强烈的统治空间,而整个现代社会都弥漫着“一个意识,一个观点”的斗争与排斥状态。巴赫金分析了独白型话语的统治境况及其特征,批判了现代社会的独白状态,试图建构对话理论来解决社会困境。他用参与性思维概念和应分概念来规范对话主体;前者促进对话者内在价值规范和行为的融合,促使对话主体以内在行动实现社会责任,解决了现代社会行为动机和行为产品间的鸿沟所导致的危机。后者将对话主体建构为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唯一的不可不为性的责任承担者,规范了对话主体的行为心态模式,从理论上提出了解决现代人的责任危机,为对话理论的建构打下了概念和逻辑基础。

[关键词]巴赫金;对话理论;独白;应分;参与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I0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923(2016)03-0005-06

巴赫金指出:“生活就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回答、同意等”^[1];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过程中,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才能被揭示出来(甚至这也仅仅是局部的)。^[2]“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链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3]这是其对话理论的核心观点。他对话在生活、真理和思想三者中价值的肯定,是现代独白型社会一缕耀眼的阳光。他通过对现代社会独白的话语状态及其困境的批判,为对话理论提供了生存基础。在行为哲学视野下,他用参与性思维和应分两个概念规范对话主体的行为和责任状态,以此纠正独白型社会的思想、行为和责任之间的鸿沟和危机。

一、为解决现代社会困境的对话理论

抛开生活中的对话不去讨论,在西方,对话作为话语形态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时代就出现了,苏格拉底对话依然是目前艺术和教学领域中一种经典

的教学方式。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亦有孔子及其学生的对话语录。但是,这些文献的存在并不足以证明农业社会中可以找到普遍存在的对话关系;很明显,农业社会严格的等级关系和制度禁锢了对话关系的形成。在这样的逻辑视角下,在农业社会统治行政模式中形成的是以“发话与回话”为特征的支配性行政决策话语,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话语。

启蒙时代开始,天赋人权的平等关系因为结合了“天”的力量,加之社会和人的双重需求,作为社会交往的准则,逐渐深入人心。这一新的社会力量,对农业社会支配性行政决策话语结构的基础——等级——在生活和法律意义上都做了消解。以此为基础,处于工业社会竞争型社会关系中的原子化个体,对独立的话语权便有了强烈需求,当这种需求融入民主政治后,现代社会对独白型话语的需求便越来越强烈。但是,现代社会竞争型社会关系在原子化个体间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沟通张力,这

收稿日期:2015-05-16

作者简介:谢新水(1973—),男,湖南省涟源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员。

样一来,工业社会中的话语处于交锋状态时必然表现为“各说各话”。这种话语状态可以称为独白型话语状态。

独白是工业社会竞争性民主反对农业社会等级禁铜的产物,但它在自我发展过程中最终又表现为另一种形式的禁铜。在现代社会“机械的整体”中,独白型话语入侵到了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与现代化发展伴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60年代进入巅峰,逐渐地,独白型话语主宰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有了巨大的统治空间。生活在前苏联时期的巴赫金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意识形态对抗和国内集权专制统治等时期,这一特殊环境促使他在对独白型话语及其造成的社会困境进行深刻的批评与反思。可以想象,在独白的社会环境中,巴赫金提出多元性世界作为建构对话理论的社会哲学观对于当时所处的意识形态而言是非常尖锐的。因为现代社会独白与意识形态融为一体。用“一个意识,一个观点”去排斥其他表意的共同体的意识和观点,是20世纪中西方意识形态典型的特征。

巴赫金指出:“独白型原则在现代能够得到巩固,能渗入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得力于欧洲的理想主义及其对立的和唯一的理智的崇拜;又特别得力于启蒙时代……整个欧洲的乌托邦空想主义,也同样建立在独白原则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连同它对信仰万能的坚信,就是这样。任何一个表意的统一体,到处都是以一个意识、一个观点作为自己的代表”^[4]。在东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基于独白型原则的指导,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自营造、维护和引导着冲突的意识形态领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竞争和冲突中,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对抗无法融化;冲突排斥和竞争越来越激烈,它们与国家利益和军事竞争掺杂在一起,相互否定,最终形成了世界的两极对立。巴赫金敏锐地指出了意识形态领域独白的顽固性。他指出:“被否定的他人思想,不能打开独白型的语境,相反这种语境会更绝然,更固执地封闭在自己的疆界之内”^[5]。因此,独白型原则支配下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是封闭和狭隘的,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灾难。

尽管巴赫金对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的独白状况考察得非常详细,由于学科的限制,他没有考察它在官僚制组织中的典型表现。我们认为,现代社

会的官僚组织同样是典型的独白症患者,它运行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冷漠、缺乏回应性、僵硬性,本质上是一种独白病态。横向的组织体系中,形成独白话语的基础是专业性和权力边界,表现为竞争性隔离状态。同一部门的层级之间的独白体现为上下级间的支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命令与服从关系,它保留了支配型话语的众多特征。独白原则支配性的官僚制组织是一种外部控制性强,内部有顽强边界的“机械整体”。独白话语的排异性促使“任何官僚制组织的中心领域,对于其他官僚制组织而言,都是异己领域”;在官僚制组织内部边缘领域和外围界限模糊的领域,彼此会“为地位而斗争”^[6]。这些竞争冲突既表现为官僚体系的自利性也体现为官僚组织之间的地域之争。在工业社会管理行政发展的各阶段,独白型话语弥漫在所有的组织形态中,这种表现在“行政国家”形成后达到了顶峰。理论界有关民主行政、参与行政和参与治理的提出,都是对这种独白型话语状态的批评和挑战。

在行政效率原则的指导下,官僚制政府领导层的各级领导者大多是话语权的占有者,是垄断性地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导者和决策者。根据独白的决策原则,官僚组织视管制者为需求一致的个体,用充满技术性和科学性的独白性决策,忽视或抽象掉差异性,漠视多元价值;从而,决策所影响的对象毫无例外地被形式化。我们亦认为,独白型话语支配的组织形式是导致官僚制组织“死亡未来”的关键原因。19世纪中期,当工业社会在西方开始启动时,密尔思考适合于那个时代的政府形式时得出结论的结论是:“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形式是代议制政府了”^[7];但是他担心代议制的弊端,认为“官僚政治的政府深受其苦的弊病,以及通常招致其衰亡的弊病是例行公事。它们因他们准则的不可改变性而导致衰亡;尤其因这样一个普遍法则而至衰亡:凡是变成例行公事的东西都丧失生命力,不再具有在其内部起作用的精神……”^[8]。密尔所说的普遍法则、例行公事其实就是独白型话语在官僚组织领域中的表现形式。

独白型话语的统治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独白型话语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这是巴赫金在建构对话理论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指出:“如果说科学主义、启蒙主义促进了独白思维,那么,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给人文科学的冲击和影响更是与日俱增,对人文思维不能说没有负面影响”^[9]。在《艺

术与责任》中他认为现代社会是“机械的整体”。这样的社会“只是以外在联系综合于空间和时间之中,却没有内在的统一涵义贯穿于其中……这一整体的各个局部,尽管并列在一起,相互联系,但内在却扞格不入”^[10]。他对现代社会“内在地却扞格不入”的状态的判断是其思考对话理论的前提。

艾利亚斯对现代社会“机械的整体”的分割状态做了同样的描述。他说:“那些一生都被限制在狭小的、前国家的血缘集体里的个体个人,其相互间的分离和分割的程度,过去和现在不见得就比高度分化的国家社会的成员要低。在后一种情形下尤为突出的,是单个人在其彼此联系中的那种被分离和被隔绝性。”^[11]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中的分裂是彼此联系中的“被分离和隔绝性”。这种高度分化中人的“彼此联系”就是一种竞争性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人和人之间貌似联系,实际上是高度分离和隔绝的原子化状态。在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中,竞争者只能选择独白。当然,在前国家的等级制中“个体个人”也是很难找到的。

在现代社会“机械的整体”背景下,巴赫金对独白型话语的特征的界定深入、清晰和深刻。他指出:“独白是完美的,对他人回答充耳不闻,独白不期待回答,不承认它有关键的作用。独白不需要他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将所有的事实都客体化”^[12]。独白的特征是明显的。

其一是单向性。独白是独白者单向的独白。在独白过程中,独白者很难理会他人。他表达他所表达的,说他所要说的,无论在内容上还是目标上,它的基本目标和指向是说出来,是表达“他的”意见;他充耳不闻别人的观点。如果说,他在乎别人的观点,这点理性其目的是排斥和拒绝。其二是自足性。自足体现为一种自我认可的完美状态。独白者认为其意见、决定是完美的。既然自封为完美,视自己的话语为一块无瑕的宝玉,独白者就可以拒绝与别人讨论,更不要说去修改和完善自己的言辞。其三是客体化。客体化的过程是将他者物化或事实化的过程。目标单一和自足促使独白者直接将他者客体化,独白者自足地独白,毫无保留地将他人排除在其思维世界和沟通世界之外。独白者的目的是说出,是抛出,是增加外界的信息,所以独白者看起来总是强势,毫无顾忌。为了客体化他人,他锋利自己的话语,使之有冲击力的,如剑如刀,甚至如原子弹,希望摧毁所要摧毁的一切。很难

想象,独白者会理解别人,包容别人;不难想象的是,独白者希望说出更多断言、旨意,甚至于说谎也不足为虑……

单向性、自足性和客体化的独白是现代社会危机形成的主要思想动力。在个人的意义上,独白分裂了话语主体和责任的联系,表现为行为者、行动动机和行为责任的分裂。在社会的意义上,独白者分裂真理和行为事实之间的关系,变现为理论和实践的分裂。巴赫金对各个领域独白型话语的批判,对独白特征的深入分析,是建构对话理论的重要基础,阐明了他建构对话理论的背景和目的。

二、用参与性思维解决现代社会行为危机

参与性思维是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这个概念规范了对话主体的责任模式。下面我们从参与性、参与存在这两个概念出发来理解参与性思维,并探讨这一概念在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价值。

巴赫金的行为哲学试图用参与性概念来解决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脱节的问题。他观察到,既往的推论性理论思维、历史描述和审美直觉,与历史现实、可体验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裂。这种分裂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首先在哲学意义上消除这种矛盾就十分必要。为此,他一方面将理论理性视为实践理性的一个方面,让实践理性和生活世界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他对责任做出了新的界定。他认为,如果要履行生活世界应有的责任,仅看某种责任是否有价值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考虑主体的行为责任。因为意志、意识的统一性和存在的统一性必须与行为事实融合后才有价值;如果缺乏行为事实的融入就没有价值。只有和行为事实,只有同独一无二的个人发生联系时,意志、意识和存在才能真正产生实践价值。巴赫金根据“我以行为实现着我自己的全部生命的理念”作为价值观,提出了参与性的概念。^[13]他认为“参与性”概念是人对世界的一种态度和在世界中的生存方式^[14],解决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首先要肯定我参与存在价值。他认为:“我的唯一是实际地参与存在(我也在其中)的这个事实,对我来说是核心的事实,对于理论存在的概念却是无足轻重的,不能给这个概念增加或减少一分一厘”^[15]。但是,在实践世界,或者在行为哲学之中,参与存在这个事实,对我和世界的关系的建构有特殊价值。参与存在才是实践的存在,只有实现了参与存在,才

能将我的生活纳入现实世界,才能使我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因素。

在巴赫金的视野中,参与性思维是一种行动思维,在参与性和参与存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巴赫金认为参与性思维对于建构对话理论非常重要。他表示:“参与性思维,也就是在具体的唯一性中,在存在之在场的的基础上,对存在即事件所作情感意志方面的理解,换言之,它是一种行动着的思维,即对待自己犹如对待唯一负责的行动者的思维。”^[16]我们根据几个关键词来理解这一定义。其一,“具体的唯一性”。这是指参与性思维的主体:即我自己是唯一负责的行动者。其二,“存在之在场”。它是指参与性思维的方向,即特定事件中我这个特定的主体必须在场,而且要在特定实践中介入我的情感意志。其三,“行动着的思维”。这是参与性思维的运动方式:即将“我自己”视为事件中的行动者、亲历者绝不是旁观者。根据这样的理解,参与性思维是指在理解、讨论、决策和解决某一事件时,我将自己视为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唯一责任者,并用我的情感和意志去思考和解决事件。

参与性思维为什么重要呢?在巴赫金看来,在社会中普遍适应的抽象价值只能是一种形式、抽象的规范,它们看起来很有价值但很难产生实际效果。一个行动要产生实际的社会效果,必然与参与、参与存在和参与性思维有关。“相同的、普遍适用的、公认的价值是没有的,因为被承认的价值大小,不是受抽象内容决定的,而是要同参与者所占据的唯一位置联系起来看,从这个唯一的位置出发,可以确认所有的价值,确认任何的他人及其拥有的全部的价值,不过这个参与者必须得到承认”^[17]。这个很有见地的观点表明,在行动中参与性思维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假设服务型政府是一个符合后工业社会发展的政府类型,并在理论上建构出一个服务型政府的模式,这仅仅是理论思维。要使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要发挥其价值,必须让理论与行政人员的行为结合起来,必须与社会对这一理论的承认和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政府和社会民众要从内心上认可服务型政府并参与到实践当中,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否则它便永远只是一个理论而已。

在西方民主国家的代议制政治中,代议制组织是公共政策等公共产品的设计者,它代表公民在政治层面设计公共政策。政府及其官僚制组织是公

共政策的执行者,执行政治代表的意志;公共政策的作用对象则是公民。在公共产品的形成链条中,公民、政治代表、执行政治意志者的之间成为了一种机械的整体。在现代政治体制和官僚体制中,从公民意志到公共产品的传递链条很多时候是断裂的,这种断裂导致了“政府之恶”。这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现代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现代行为的危机。行为动机和行为产品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其结果,脱离了本体之根的产品也就凋萎了”^[18]。

在摆脱行为危机的出路上,他希望找到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寄希望于不同于唯理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的方法,使人们成为责任主体。他认为:“摆脱行为危机的出路不在于改变文化行为产品的内容,也不在于解释和公共承认文化活动是由经济活动决定的,而在于文化行为的产品与其被先验设定的动机体系结合在一起……”^[19]解决现代危机首先要批评的我们的动机体系,要改变和“恢复行为及其行为动机之间被割裂的有机联系”,使人们成为一个统一的责任主体,那就是,“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20]。由于我的责任的统一,从而可以使艺术和生活得到统一。所以,我才是责任统一的载体,责任使我得到统一。

在思考生命和责任的关系时,巴赫说:“生命只有联系具体的责任才能够理解”;“摆脱责任的生命不可能有哲理,因为它从根本上就是偶然的和没有根的”^[21]。生命和责任的关系如此紧密,这就决定了参与性思维的实践价值。只有运用了参与性思维,公共事件同个人的情感、意志、价值观和责任才能联系到一起,公民在政治参与中的冷漠才会越来越少。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了参与性思维的存在,“在不同参与者对世界的诸种价值之描写之间,没有也不会产生矛盾,无论是来自意识的矛盾,还是单纯来自唯一位置的矛盾。”^[22]

理解参与性思维在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重要作用,要从他对对话在生活、真理和思想三者中价值的肯定为出发点,如果没有参与性思维,对话主体在这三者中就没有任何价值。

三、用应分解决现代人的责任危机

除了参与性思维以外,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的应分概念对对话主体进一步进行了规范。只有充分理解应分才能理解巴赫金对对话主体责任的严格要求,抽出这个概念,他的理论就缺少恰当的主

体。因为现代人的行为危机要应分概念来解决。

巴赫金其《论行为哲学》用否定的方式提出了应分问题这个概念。他认为应分不是一个高度形式化的范畴,也不仅仅是判断的形式因素,不是专门理论的一部分。因此,应分问题包含行为与理论价值两个必然要素,是两者所形成的关系。他说:“当真理与我们实际认识行为联系起来时,才会产生应分的问题”。^[23]这一命题的前提是“真理+认识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将应分问题规定为特定的认识行为和理论价值是否结合的问题。他强调真理和行为的结合,认为单一的理论范畴不产生应分问题,“审美上的、科学上的、伦理上的应分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具有审美、理论和社会等方面价值的东西。”^[24]简单而言,理论和实践行动的分离会产生应分问题;理论和实践行为如何结合的问题是解决应分问题的思路。可以说,当主体没有发自内心用真理去回应行为并付诸认识的行动时,应分问题就产生了。应分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正确的人类认识和人类行为如何相结合的问题。

巴赫金的应分概念对对话主体进行了两方面的规定。其一是“应”。“应”是应当的意思,是行为主体内心对承担和履行责任的必要性的内在判断,即一种义不容辞的态度。应分意味着行为主体在内心上体现为对某一事情负有应当的、不可推脱的义务责任。这种义务责任是从属于判断主体内心判断的。它不是一种权利责任,而是一种义务责任,这种责任来自于对真理的认知和实践。其二是“分”。“分”是份内的意思,意味着是特定主体的特定责任,体现为责任主体和责任内涵的相适性,责任主体和责任内涵是一致的,没有冲突;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而是从属于自己的道德判断而积极认可的。因此,应分包含了对应负和履行责任积极认可的心态。巴赫金指出:“要产生应分的因素,首要的条件是:从个人内心承认确有唯一性个人的存在这个事实,这一存在的事实在心中变成为责任的中心,于是我对自己的唯一性、自己的存在,承担其责任”。^[25]巴赫金指明了个人内心于应分的重要性,指明了个人内心将事实变为责任的重要性,这个过程和自我的唯一性是对应的。失去了内心责任,应分就沦为没有行动的道德判断。基于这样的认识,巴赫金从四个方面进一步界定了应分和对话主体之间的关系。

应分是对话的特定主体对特定情景的特定判

断。巴赫金将应分放在特定的情境中来考虑。“应分所能表明的是,只是在当下的特定条件下恰是在我的意识中实际存在着这一特定判断,即只能表明个体事实的历史具体性,而不能表明判断在理论上是正确的”。^[26]此外,应分还是特定主体在特殊情境下的内在责任。巴赫金坚持“负责行为也就是以承认唯一性应分为基础的行为”,^[27]没有内在的责任,就不是应分。

应分是对话主体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巴赫金指出,应分是特殊的,作为行为规范而言,这里所说的“特殊”是指特定的主体内心中的特定行为取向,是特殊个体意识中的某种取向。^[28]应分需要三个要素来构成:包括“我”、“具体行为”和“内心责任”。此三者发生紧密的联系成为一体后,应分就产生。仅仅是伦理上的规范还不是应分,“道德的、伦理的规范,很难说存在着确定内容的应分因素”,^[29]因为这些规范还没有和主体及其内心责任结合起来。仅仅是伦理意义上的规范,如果没有被个人所认可并依此行动,就不能进一步产生现实价值。

应分是对话主体特定的回应行为。巴赫金认为从抽象的、理论认识的角度来讨论道德问题存在很大局限,因为抽象的道德理论本身只能引导人的行为,而很难成为真正约束人的行为的力量。^[30]也就是说,道德理论本身很难约束道德行为,不然现实生活中说一套做一套的事情就不会这样多。正是因为这种局限性的存在,生活中才有这么多道德堕落者。巴赫金希望改变这种情况。他将应分界定为“我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整体中的一个因素”,^[31]是一个发自主体内心的主体回应行为。^[32]他希望应分不仅仅包含一种被动责任或者道德要求,而应该是主体从内心而来的回应,是与主体的行为心态联系在一起的,行为者承认有价值的规范的约束力,并因此愿意从心底上采取积极的行动去履行责任,“真的是我的行为中我要对之负责”^[33]的一种能动性。这是巴赫金应分概念独特的地方。

对话主体的应分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巴赫金指出:“应分恰恰是一个针对个体行为的范畴,甚至乃是个体性本身的范畴,即指行为的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唯一的不可不为性、行为的历史性”。^[34]他对应分和个体的关系要求是苛刻的,提出了行为的“唯一的不可不为性”来进行约束。对于个体而言,应分需要“由我来承认和确证”。^[35]只有通过我的参与才能形成这样的状态:“我是实际的、不可替

代的,因为我理应实现自己的唯一性”。^[36]巴赫金强调的“我的责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责任,它涉及到具体的行为,而且这个具体行为是特殊个体的特殊选择,不可替代。

巴赫金的应分概念是独特的,有特定内涵,正是因为他对应分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规定性,才从理论上对对话主体的行为模式进行了规范,其对话理论才有了主体基础;如果不深入理解应分概念,就无法理解他的对话理论中主体的状态;如果没有应分概念,现代社会的责任危机就无法找到解决的主体。

参考文献:

- [1] 茨韦塔·托多罗夫. 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 蒋子华,张萍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309.
- [2]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M]. 钱中文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4):372.
- [3] [4][5]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5卷[M]. 白春仁,顾亚玲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101,104,112.
- [6] 安东尼·唐斯. 官僚制内幕[M]. 郭小聪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27-229.
- [7] [8] J. S. 密尔. 代议制政府[M]. 汪瑄译. 上海印书馆,2014:52,86.
- [9] 白春仁. 巴赫金—求索对话思维[J]. 文学评论. 1998(5).
- [10]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1卷[M]. 晓河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1.
- [11] 诺贝特·艾利亚斯. 个体的社会[M]. 翟三江,陆兴华译. 译林出版社,2003:140.
- [12] 茨韦塔·托多罗夫. 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 蒋子华,张萍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325.
- [13] 巴赫金. 行为哲学. 哲学译丛[J]. 林山译. 1992(1).
- [14] 朱小曼,杨桂青. 关于负责人的道德主体如何成长的一种哲学阐释——基于对巴赫金道德哲学的解读[J]. 全球教育展望,2011(2).
- [15][16][17][18][20][21][22][23][24][25][26][27][28][29]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1卷[M]. 晓河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2,6-8,12,42-48,53,56.
- [19] Л. А. 戈戈季什维利. 复调话语的渊源:论巴赫金的宗教人类学第一原则[J]. 凌建侯译. 俄罗斯文艺,2015(1).
- [30] 朱小曼,杨桂青. 关于负责人的道德主体如何成长的一种哲学阐释——基于对巴赫金道德哲学的解读[J]. 全球教育展望,2011(2).
- [31][32][33][34][35][36]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1卷[M]. 晓河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1):6-8,27,41-42.

(责任编辑 周雪梅 黄海丽)

Goals of the Bakhtin's Dialogue Theory and Norms of the Dialogue Subject

XIE Xin-shui

Abstract: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 monologue discourse occupies a strong dominant space in the thought art, ideology and bureaucracy, thus the whole modern society is filled with “a sense of consciousness, a point of view” of the struggle and the exclusion of the state. Bakhtin analyz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nologue discourse, criticized the state of modern society's monologue, and tried to construct the dialogue theory to solve the social dilemma. He used the concept of participatory thinking and the divided concept to regulate the subject of dialogue, the former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nal value norms and behavior of the interlocutors, and urges the dialogue subject to realiz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action, and solves the crisis caused by the gap between the behavior motivation and the product of the modern society; the latter construct the dialogue subject with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as the responsibility undertaker, regulates the behavior mentality model of the dialogue subject,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 to the crisis of modern people's responsibility in theory, and provides the conceptual and logical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alogue theory.

Keywords: Bakhtin; Dialogue Theory; Monologue; the Divided Concept; Participatory Thinking